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内涵及其生态哲学意义

刘雅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209)

[摘要] 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内涵及其创新意义, 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目前, 国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内涵的诠释, 存在着分类标准不统一以及内涵不够系统完整的问题。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诠释框架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 就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下更为全面地展示它的丰富理论内涵, 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创新, 即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而且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观 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4)07-0045-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7.0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 如何在一个系统严整的结构体系中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创新,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近年来,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学术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也存在对基本理论内涵把握不够全面以及内涵分类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首先, 仔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六观”的创新论述, 我们会发现,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与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和民主观相并列的。这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重大创新的论断, 是对一系列重大创新点的概括性凝练和举要性表达。因此, 当我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时, 可以结合其他创新点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创新概括为生态世界观、生

态价值观、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民主观的创新。但是, 这也会存在着内涵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即这种表述显然不是在同一个标准下作出的分类。其次, 作为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内涵非常丰富, 不仅包含着生态维度上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思维观、发展观、治理观、共享观等一系列理论创新, 同时还包含着生态工作战略、策略和方法的创新。^[2] 因此, 在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下尽可能系统地全面地呈现中国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从而提供一个新的阐释框架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3] 据此, 我们要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识性框架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即将其划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方法论”, 以便系统地完整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就“生态方法论”而言, 依据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生态思维方

法、生态工作方法和生态工作策略。所谓生态思维方法,是以生态世界观为指导,分析生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生成机制,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确立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等一系列矛盾关系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大会上阐述的“六项原则”^[4]确立了生态思维的根本遵循,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部分对“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5]的论述,揭示了生态思维方法的具体内涵。生态工作方法是生态思维方法在生态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应用,具体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抓铁有痕、注重全面协调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方法。做好生态工作,不仅要坚持科学的生态思维方法和生态工作方法,还必须注重生态工作策略,“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6]正确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的关系等。^[7]

就“生态世界观”而言,这是一个内涵尤为丰富、但如何作出总体性归纳和阐释又存在学术性争议的问题,也是我们试图重点分析的问题。从总体上看,(1)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所指向的场域差异,把它划分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和生态历史观;(2)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所内蕴的价值指向,把它划分为生态发展观、生态治理观和生态共享观。

需要注意的是,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体系框架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理论内涵,它不仅具有哲学的高度和哲学的意蕴,而且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新时代创新,体现出丰富的生

态哲学内涵。尤其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哲学品格及其思想要素,梳理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学等生态哲学思潮谱系的流变,就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已呈现出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基本内涵

从本质上看,生态问题所关涉的是生活于一定时代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关系不仅生成于而且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自然、社会、历史、思维方式等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作为对生态问题的一种理论观点,生态观是从哲学视角看待自然、社会和历史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主要聚焦于对世界的基本观点。由于“世界观”与“观世界”是一体两面的理论整体,后者聚焦于观察世界的特定价值视角。从对“世界”的基本观点看,依据生态观所指向的场域差异,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划分为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和生态历史观等;从“观察”世界的视角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指向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包含着生态发展观、生态治理观和生态共享观等。

1. 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与生态历史观

自然、社会与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场域。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此“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8]正是在现实个人的劳动活动中,先在性的自然界才成为属人的自然界,并同时生成人们对属人的自然界即作为劳动产品的自然界的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从而呈现一部恢弘的人类历史——人类的自然史与社会史。只有基于人类的自然史与社会史,才会生成生态哲学的理论视角,而这一视角集中表现为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与生态历史观。

生态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9]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一种人类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开启,也意味着一种与西方现代化奠基其上的工业主义自然观截然

不同的新型自然观，即生态自然观的历史性生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自然观经历了从蒙昧时期的原始自然观、农业自然观到工业主义自然观的历史演进。自资本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驱动机制以来，它就篡夺了自然的神圣地位，破除了人类对自然的尊崇；它借助现代自然科学，依据绝对性的“效用原则”把自然纳入资本的“有用体系”，建构起工业主义的自然观。工业主义自然观既是资本逻辑以及为资本逻辑所操控的科学技术双重作用的产物，又现实性成为资本逻辑和依循资本逻辑运行的科学技术无限扩张的助推力量，三者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化的强大驱动力，不仅造成人与人的对抗，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对抗，造成了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自然观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永续发展、人类现代化事业能否行稳致远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性实践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开启，必然要突破工业主义自然观，构建起新型现代化事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赖以据的新型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要义是：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界普遍联系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并创新性地赋予人与自然界以“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它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刻画为相互依存的生命关系，“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10]人与自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11]要像爱护眼睛、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然。

生态社会观。正如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虽然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直接指向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和谐，但它必然关涉到并内在地蕴含着对和谐社会生态的期许，因而包含着生态社会观的基本要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要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生活，而且要求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包含着生态社会观的基本内涵，而且也规制着生态社会观的核心要义，即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等等。

生态历史观。生态历史观从生态学视角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把自然生态看作是理解和研究人类文明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就是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论断。立足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性视野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理论，而且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演进的新维度，即生态思想维度，从而衍生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即生态历史观。生态历史观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看待人类历史的演进及其未来趋势，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反观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历史并据此展望人类文明的未来进展，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演进和人类文明进展的必然进路和共同愿景。从大历史观看，生态历史观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归宿，即“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2]从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关联看，生态历史观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3]“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14]从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看，生态历史观指向作为历史性生成的新型现代化实践及其由此而创生的新文明形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确立了新型现代化理念与实践，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形态迈向新阶段。

2. 生态发展观、生态治理观与生态共享观

生态观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个人，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历史生态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人与自然界的自然和谐生态、人与人在社会体系中的社会和谐生态以及人类历史文明在生态尺度内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历史生态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生态观必然包含着原则性的价值立场和直接现实性的价值指向。从价值立场和价值指向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包含着生态发展

观、生态治理观和生态共享观。

生态发展观。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发展观念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或价值指向。作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中，但只有朝向好的方向的运动与变化才称之为“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与“进步”乃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向往。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赋予发展概念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评价，因而在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理念，并表现为如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观、经济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观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在于经济、社会与生态协同发展，它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观，强调在保护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由经济增长观向经济发展观，由单一经济增长观向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观的根本转型，强调依靠科技赋能助推发展方式和增长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在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形成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又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

生态治理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发展观必然要求生态治理的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传统单一化、碎片化、短期化的生态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创新生态治理观，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立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财富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综合主体观，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等协同发力的系统全局观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15]的世界格局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治理观已经形成包括治理

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法规、治理机制和治理宗旨为主要内容的完整体系。

生态共享观。生态发展和生态治理的价值指向是生态共享，生态共享观是生态发展观和生态治理观的落脚点。生态环境是普惠性的社会公共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共享观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共建基础上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共享观主张世界各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理念，携手共建人类地球家园，共享生态治理成果和清洁美丽世界。生态共享以生态共建为前提。针对历史责任不同、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历史文化有别，在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上，中国政府一贯倡导并坚决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主动承担节能减排义务，坚决反对在国际性生态治理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生态霸权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16]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全球共享观，倡导以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理念为基础维护全球生态正义，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在共商、共治、共建基础上共享全球生态治理成果，使生态成果真正成为惠及人类民生福祉的公共产品绿色。

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哲学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蕴含着重大理论创新，即呈现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形态的孕育。在生态哲学的学术谱系中，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思想传统，而且借鉴并超越了西方生态哲学的思想资源。

1.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系统性阐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革命，是从作为现实个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活动出发对理论哲学范式的超越，本质性地突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二元对立的旧哲学范式，并在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结合中规

划出现代化的本质性指向——作为共产主义核心要义之一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生态哲学品格，包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要素。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就开创性地把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称之为“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核心内涵乃是人与自然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即自然界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18]在这里，马克思以德国哲学特有的表达方式揭示出生态自然观的本质性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鉴了德国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农业化学的理论资源，以“新陈代谢”这一更具生态科学色彩的概念刻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并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恶化称为“新陈代谢的断裂”。^[19]

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赋予人和自然界以感性对象性的现实性，同时也赋予其历史性内涵，即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直接存在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界的冲突。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瓦解和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据此开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并把这两个矛盾的解决本质性地指向共产主义这一新人类文明类型。从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维度看，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新人类文明类型的本质性内涵，一方面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0]

可见，置身于资本主义的时空境域，马克思已经揭示出社会主义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和生态共享观的核心要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向度。但是，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只是散见于一系列经典文献中，而且长期以来也并不为人所重视。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巨大的理论魅力，而且正在孕育生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它的理

论表现聚焦于一系列创新性中国话语标识：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人类文明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是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界是对象性关系的感性自然观的当代创新，生态社会观是对马克思理想社会构想在生态哲学维度的丰富与发展，生态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论发展，生态共享观是对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新时代创新等；它们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注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性内涵，同时也正在孕育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新境界。

2.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是对西方生态哲学思想资源的借鉴与超越

从理论形态看，作为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生态反思，西方生态思潮大致包括两部分思想资源：一是以生态文学发端并逐步上升到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国外生态思潮；二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潮。

就国外生态思潮而言，在基于生态学视角反思陷入发展困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它们引入了文学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权利、价值与伦理规范等概念工具，试图以此重建被工业文明摧毁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生态哲学的基础性问题上长期陷入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生态中心主义高扬自然的权利及其固有的内在价值，试图把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关怀扩展至自然生态系统。与高扬自然的权利乃至忽视人类自身生存权的生态中心主义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任何物种的存在都具有利己主义目的，自然的存在及其价值不仅本质上从属于人的需要，而且人的需要本身还是评判自然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前提，人的需要的充分满足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凸显出两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一是看似无解的所谓中心之争，实际上植根于作为共同理论前提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旧哲学范式，双方都“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1]只有重建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或

“命运共同体”关系，即只有超越工业主义自然观，才能在理论根基处跃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二是不论是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后果还是工业主义自然观，它们都植根于作为经济与社会运行根本机制的资本逻辑，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思、批判与超越，生态困境的现实性破解必然是虚幻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成的理论必然性。

作为超越西方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理论尝试，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并试图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和生态自然观创新的双重维度上发展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联姻，寻找化解人与自然冲突的途径。高兹以“经济理性”建构政治生态学，认为消除生态危机的路径就是以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戴维·佩珀建议通过社会主义与绿色理论的联合，构建以“弱”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威廉·莱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透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及其内在关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试图以重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破除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但从总体上看，其一，他们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质的批判都没有达到甚至远低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高度；其二，他们对超越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生态哲学构想要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要么成为浪漫主义的空想；其三，他们几乎没有关注到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思想资源，大都仍然局限于以人与自然界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相互作用范式。

通过对西方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反思，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国外生态思潮和生态哲学思想谱系的超越。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不仅充分汲取了马克思感性对象性自然观的理论精髓和思想要义，而且在“两个结合”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已经跃出了单纯的自然观范畴，而具有了生态哲学观的理论高度。正是基于作为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基石的生态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才能系统地展现内容丰富的深刻内涵，并进而孕育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理论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
- [2] 张云飞. 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2).
- [3][5][6][9][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4]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9-13.
- [7] 习近平.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 求是，2023(22).
- [8][17][18][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211，528，187、194，185.
- [10][1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6.
- [11] 方世南. 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74.
- [14]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5.
- [1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07.
- [19]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19.
- [21][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译者：刘仁胜，肖峰.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